

商务印书馆与我同龄

陈翰笙

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2月，我也是那年2月出生的，恰好是同龄啊！算来商务是一个有九十年历史的出版社了。它走过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，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漫长道路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。随着殖民者的入侵，西方的先进科学和资产阶级新文化也陆续传入中国。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想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，于是维新变革的思潮一时风行全国。商务印书馆适应了时代潮流的需要，在上海开业，并站在资产阶级新文化一边。为提倡新学，兴办新学校，培养新人才，出版了大量适合时代需要的书，不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，作出了突出贡献。在青年求学的时候，我就读过商务出版的书，受到启蒙教育。大概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或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，都会知道商务印书馆的。

我与商务还是有些缘分的。我不只读过它出版的一些书，还当过它的编辑！那是1928年，根据党的指示，为了不暴露党员身份，我从苏联转道日本回到了上海。那时，王云五是商务的总经理，聘我到商务审查百科全书的稿件，计划整理、出版。于是在这年夏天至1929年秋天，我同商务订了一年的工作合约，就成了商务的编辑。在审查稿件中，我发现稿子比较乱，多数质量不高，就把它分为三类：一类大约有六分之一，可以采用；二类近六分之二，可作为专门词条汇集出版，供参考用；三类占总数的一半，质量差，不能采用。我把审查意见分类列表送给王云五裁夺。他看后很失望，觉得我审查得太严格了。不过，在我工作的那段时间里，更加深了对商务的了解，它对书稿的质量把关较严，不粗制滥造。特别是出版了不少中外语文工具书、学术名著，为人们学习提供了方便，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书。工作一年，离开商务，蔡元培介绍我到中央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所工作。当时有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以此作掩护搞社会调查，我参加了调查日本纱厂的包身制，特别是女工倍受剥削的情况，写成调查文章揭露其侵略剥削的实质。因此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，怀疑是共产党搞的。以后，我们便转到农村作社会调查，积累了大批资料，写了一些文章，出版了一些读物。商务印书馆由胡愈之主编的《东方杂志》，为宣传新思想提供了阵地，发表了不少我们写的调查文章。这个杂志在当时可说是独树一帜，被社会公认为是进步的刊物。这方面的成绩也应予以充分肯定。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猖狂侵华，日军占领闸北，商务大楼被焚，遭受严重损失，我同

商务的关系也就中断了。但是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，商务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
三

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全面地历史地看，才能作出正确公正的评价。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单位，是由私人开办的，但赚钱不是主要目的，主要是办企业的人，具有开明实业家的眼光，是卓越的实业家。像夏粹方、张元济等人就很有见地。他们出版的总方向是对头的，中西文化都照顾到了，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，是为了发展我国民族的新文化。据我所知，它并没有为了多赚钱去出版那些荒诞低级、黄色淫秽、乌七八糟的书，而是出版了大量健康有用的书。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，商务最早编印了新式教科书，给开办新学校提供了启蒙课本。它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学术著作，象严（复）译、林（纾）译和世界名著的出版，就为那些寻求救国救民良方、求真理的人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，受到了启迪，可说是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。商务在积累文化知识上成绩突出，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商务是一个进步的、很重要的出版社。近几年再版了严译、林译及出版了世界学术名著二百多种，这是件好事情。严译、林译还是有参考价值的，但今天不容易找到了。了解了商务的过去，才会珍惜现在，今后也才会努力多出书，出好书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。

四

新中国建立后，商务也获得了新生和发展，成了国家一级出版社。出版方针更加明确了，它主要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翻译出版外国古今的重要学术著作，也出版一些国内学者的专著。1959年商务出版了我编著的《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》，并根据社会需要于1982年重印了这本书。1962年为了普及外国史知识，商务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一套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，并成立了编审委员会，由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任主编。我是编委，为它写了一本《印度莫卧儿王朝》的小册子；也审查过书稿。记得出版到五十多种书时，不幸“文革”发生了，它同主编吴晗一起罹难遭殃。拨乱反正后，1979年底，“商务”又恢复出版这套小丛书，并成立编委会。

我被聘为编委会主编，协助商务制订了选题计划。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迄今已出版了二百多种，还按内容分类出版了合集，今后将按计划尽快出齐这套书，以应社会的需要。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很聪明的，可是由于十年浩劫，学校教学和社会教育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，文化知识，尤其是历史知识贫乏，不知道世界的昨天和今天，常闹出不少笑话。要知道，一个人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是不行的，不知道世界的过去，就不了解现在；不了解世界的现在，也就很难建设好我们的国家；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，就不知道如何爱惜我们的社会主义。商务能够在提高的基础上，注意普及，恢复出版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是件好事情，给青年人提供了精神食粮。据我了解，外国的出版社也很注意出版各种普及知识的读物，并且多由专家、学者编写。这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很有意义。这方面“商务”也有优良传统，它曾经有计划地出版过多种普及性的丛书，其中《万有文库》最有名，过去许多人读后都得到有益的启迪。因此，不要看不起“小东西”、“小玩艺”。我要在有生之年帮助商务出版好这套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。它虽比不上《万有文库》，但出齐后有四、五百种，编四十多本合集，约一千五百万字，小中见大，可为高等院校及中学文史教师提供重要的教学参考材料，是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。向广大青年读者普及历史知识，为青年人做点有益的工作是我的愿望。

此外，商务每年还为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外语出版一些教材和读物，也是值得称道的。为了年轻人学好英语，我选译了《英美短篇时文选》（英汉对照，两册），商务已出版了。

五

商务的历史很长，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它有许多做法是值得研究、借鉴的，要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，就要靠商务的老同人！我在商务工作的时间不长，谈不上什么经验来。据我观察，有如下几方面值得重视：一是有一批热心于出版事业的人，从“商务”的创办人夏粹方，到先后具体主持业务的张元济、王云五等人，多数有学问，事业心强，眼光看得远，又脚踏实地地办事，所以能推动出版事业不断发展；二是能适应时代要求，接受新思想，有革新创造精神。商务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，印刷技术

的不断改进，有一套管理事业的科学方法，这一切都离不开这种精神。那时的上海，出版界竞争也很厉害，因循守旧就得不到发展，还难维持下去。现在翻翻过去商务出版的书，就会看到从内容到印刷装帧，都是不错的，现在有些书还比不上它；三是重视人才，一方面同社会上的专家、学者保持联系，约请他们写书、翻译，支持出版事业，一方面注意搜罗人才，不断充实加强编辑力量，象沈雁冰、胡愈之、叶圣陶这些名人都在商务当过编辑。它还注意培养青年编辑，拿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舍得智力投资，只要有培养前途，勤奋好学，尽管没有什么学历的人，也尽力培养，通过学习和实践，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。由于商务的编辑力量较强，保证了书籍的质量，得到社会的公认；四是摸索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可行的制度，又注意社会信息，能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需求，有自己的印刷厂和发行网，所以商务总是有新书供应读者。我说的这些是粗线条的，很不全面，但值得今天从事出版事业的同志研究、借鉴，以使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搞得更好。

六

出版社是向人们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，总要跟上时代的要求。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，正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需要各出版社出版更多更好的书提供读者。为此，建议商务考虑：一是成立编辑委员会（或咨询委员会），吸收有经验的老编辑和有成就的编辑参加，帮助出主意、想办法，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展，加强业务指导；二是有计划地充实编辑队伍，除继续加强社会联系、使用社会力量外，应了解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的状况，业务对口，本人又有志于从事编辑工作的，调来充实编辑力量，同时有计划地培养在职的年轻编辑，以不断增长知识，增强才干；三是设法加快出书的速度和提高印刷质量。建议商务收回自己的印刷厂，以保证重点书籍的出版；四是根据出版方针，除继续出好分工范围内的书外，还应办几种有特色的刊物，以普及中外文化知识。你们办的《英语世界》、《日语学习》就不错，为有志于学习外语的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。过去商务办过几种期刊，起了传播文化的积极作用。今天商务办期刊更有条件了。

总之，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家的一级出版社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书是可以办到的，是大有作为的。我期望它更加兴旺发达。只要高瞻远瞩，放眼世界，放眼未来，时时想着国家的需要，读者的需要，就会奋发前进，出版更多更好的书，为“四化”建设做出新贡献！（王文光记录整理）

（上接第一版）大家听了都很感动，蒋介石也茫然不知所措，说不出回答的话。主持会的人见势不妙，就赶紧宣布说：“礼成散会”。

张老先生在这种场合下，替人民说话，人民也很赞许，1949年推举张老先生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，第一届政协开会时，张老先生也来京参加。

当时我已经开始受到批判。张老先生还派人拿名片到我家问候。当时我觉得这位老前辈不仅可敬，也可亲。

在1946年，我曾经把我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零碎文章编为一个集子，题名为《南渡集》，在出国以前把稿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，到1948年我回国后，知道版已排成，并看过了校样。后来全国解放，这部集子就没有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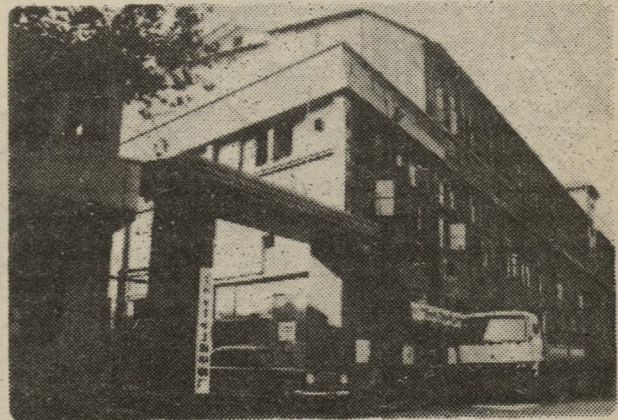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有了改变，我接到该馆的通知说，它和我的各种契约，除《中国哲学史》外都废除了。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。他们的处境我了解，他们做事我也谅解。后来商务印书馆专业化，它的专业和我的专业不对口，老伙伴的关系就不能恢复了。虽然如此，老伙伴的历史是不可磨灭的。抚今思昔，感慨系之。

现在对外开放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重要，商务印书馆必能本其专业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亦年逾九十，不能当新伙伴，犹以老伙伴的关系，与有荣焉。欣值商务

印书馆创立九十周年庆祝之际，我仅以老伙伴的资格，敬祝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日益兴隆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做出更大的贡献！



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

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

1897—1987